

# 我的阅读史

洪子诚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# 我的 阅读史

洪子诚  
著



NLIC 2970698489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阅读史 / 洪子诚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1.4

ISBN 978-7-301-18753-1

I. ①我… II. ①洪… III. ①读书笔记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G7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57969 号

书 名: 我的阅读史

著作责任者: 洪子诚 著

责任编辑: 张雅秋

排版设计: 河上图文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301-18753-1/I · 2332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cbs.pku.edu.cn> 电子邮箱: [pkuwsz@yahoo.com.cn](mailto:pkuwsz@yahoo.com.cn)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

编辑部 62752022

印 刷 者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50mm × 980mm 16 开本 19.25 印张 239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邮箱: [fd@pup.pku.edu.cn](mailto:fd@pup.pku.edu.cn)

## 序

“阅读史”这个夸张的题目，却是起于有点消极的念头。2002年从北大中文系退休之后，明显感到缺乏前些年教学、研究的情绪和精力，便常常想自己还能做些什么。2001年，我给“曾经北大书系”<sup>①</sup>写过一本书评，因为是面对年轻人（也可以说是我的学生辈）的作品，其中便有这样一段话：

像我们这些过了六十岁的人，见面会被人称为“先生”……参加什么研讨会、首发式，按照官职、知名度、年龄大小等因素综合考虑，会被安排在前排或靠近前排的地方就座。会让先发言。会让先举筷。会让先退席。然而，除了一些学养深厚、精力旺盛者（这样的人当然不少）外，我们已经在或明或暗地走向衰败。词就是那几个词，句子总是那些句子。内心的喜悦、怨恨、缠绵、悲伤都已十分淡薄。“回忆”也因为没有鲜活体验的激发而落满灰尘。许多书，已经没有精力去读。许多路，已经无法去走。也去旅游，却难有这样的期待：“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风景，有我所不曾认识的人在等待着我，那才是岁月赐给我的圣餐。”那些说不出名字的事物已经不能让我们“疼痛”。面对壮

<sup>①</sup> “曾经北大书系”第一辑收入吴晓东、郑勇、杨早、橡子等的著作。北京，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。这篇书评收入我和么书仪合著的《两亿集》。

丽的景色我们也会静默，但已分不清是内心的震撼，还是内心的毫无反应。

写这些文字的时候，多少带有调侃的意味。但随着岁月不断流逝，这些感觉也变得更加真实起来。“阅读史”的写作念头，便是在这样的心情中浮现的：寻找一种不过分费心查找资料，不必为说出的话的“正确性”紧张思虑的写作。自然，从另外的方面想，这种选择也包含“积极”的成分。以前，不管是上课，还是确定研究课题，注重的是对象的性质、价值。这回，或许可以将重点略略转移到写作者自身的问题上来，更多地从自己的感受、经验上来选择题材和方法。

从目前已经完成的部分看，论题仍与当代史（当代文学史）紧密相关——这几乎是没有办法挣脱的老套子。与以前不同的是，它们以侧重个人的方式、角度来进入。因为设定是“个人”，就有可能给过去干涩的文字添加一点水分，一点情感，也有可能收缩评价的尺度，将它降低到个别的感受和认知的范围。个人的感受的价值当然不能和那种代言式的叙述，那些宏大叙事相提并论，但也可以为一些有差异的，有的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小碎片留出表达的空间。

恰好北大出版社的编辑张雅秋正在策划一套个人阅读史的丛书，我的想法便与她的计划不谋而合。据我所知，当初她同时向几位学者、诗人组稿，他们也都慨然允诺。几年过去，好像只有我当成一件事去做，其他的都没有动笔。这也是很自然的：他们正值盛年，前景广阔，迫切的事情应接不暇，犯不着回过头去搜寻这些陈谷子烂芝麻。

说是“阅读史”，谈及的应该是这几十年中感触最深，最影响人生道路的那些书籍。其实不全是。可以看到，这里写到的，是与这些年从事的工作相关的书，还有就是多少能说出一些话来那部分。我也读过不

少不大能清楚说出许多道理的书，它们有的我可能更加喜欢，感触也更多。

集子里的文章，不少已在报刊上刊登过。感谢《中华读书报》、《南方文坛》、《文艺争鸣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天涯》、《海南师大学报》、《鲁迅研究月刊》、《文景》等为它们提供了宝贵的篇幅。贺桂梅2009年对我做的访谈，也说到一些读书的事情。因此，这篇访谈作为附录也收进这个集子中。

洪子诚 2011年3月

# 目 录

序 / I

语文课外的书 /1

我的“巴金阅读史” /7

    附记：巴金的《法斯特的悲剧》 /17

巴金的精神遗产 /20

历史承担的意义

    ——“我的阅读史”之《郭小川全集》 /26

“怀疑”的智慧和文体

    ——“我的阅读史”之契诃夫 /32

批评的尊严

    ——“我的阅读史”之丸山升 /56

“幸存者”的证言

    ——“我的阅读史”之《鼠疫》 /70

有生命热度的学术

    ——“我的阅读史”之乐黛云 /87

“边缘”阅读和写作

    ——“我的阅读史”之黄子平 /104

在不确定中寻找位置

    ——“我的阅读史”之戴锦华 /118

一部小说的延伸阅读

——“我的阅读史”之《日瓦戈医生》/137

思想、语言的化约与清理

——“我的阅读史”之《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》/163

附记：一封来信/180

“一体化”论述及其他

——几份质疑、批评的材料/184

“限度”的意识/197

关于《切·格瓦拉》的通信/213

附记一/222

附记二/226

“组织部”里的当代文学问题

——“我的阅读史”之一个当代短篇/227

90年代：在责任与焦虑之间

——《90年代学者散文选·导言》/241

文学的焦虑症/247

“树木的礼赞”

——“我的阅读史”之《牛汉诗文集》/254

“为赞颂一切我所焚毁的……”

——“我的阅读史”之结束语/266

穿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

——洪子诚先生访谈录/272

代后记：读书的心情/299



## 语文课外的书

有朋友要我为她编的“我与语文课”的书写点文字。在她看来，我们做与文学有关系的工作的人，上学的时候，应该对语文课很感兴趣，有许多的感触。其实不然。上初小的时候，我并不爱学习，经常逃学。虽然也翻了一点杂书，但语文课（那时应该叫国文）没有留给我什么印象。用的是什么教材，有哪些课文，是哪位老师讲课，现在一点都记不起来。只记得那时经常和同学到河里游泳，河很深，我游泳的本领很不行，却居然敢往远处去冒险。再就是偷烟摊上的香烟。我不敢去偷，但偷到了我会跟着抽。还有是跑到断垣残壁间找蜗牛壳，然后比赛谁的坚硬。这样，我上课常背不出书来，经常挨老师打掌心。期末考试，好几门不及格。家长对我这样胡作非为十分恼怒，终于把我转到另一所学校。这所学校是基督教会办的，冠以“真理”的校名（49年后，这个校名被取消了，但在80年代后期却又恢复）。听说，我从此变了一个人，变得“老实”了，循规蹈矩了，一副“好学生”的模样，成绩也“突飞猛进”起来。对这些“改邪归正”的转变，我倒是没有一点记忆；这些，都是家里人后来告诉我的。他们讲起这件事，总说是神听了他们的祷告，才有这样的“神迹”发生。

不过，事情总是有利也有弊。从此，我好像换了一种性格，变得不怎么爱活动，不喜欢热闹。与人交往就心存害怕，开口说话总不怎么利索。特别是对于内心的东西，从本能上就不愿意、也畏惧讲出来。要不

是有这样的改变，我现在肯定不会在学校教书，做什么“学问”。我会选择去当兵，去野外考察，去做生意什么的。总之，上初中以后，我生活的圈子越来越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乱翻书成了我打发时间的最主要的事情。我觉得书本为我提供了另一个世界。这个世界，比起我见到的，每天所过的日子来，要有趣得多。我在生活中不能实现的事，多少总能在书里得到弥补。

因为这样的缘故，在我开始认真学习时，我便很自然地喜欢语文课。不过，教材里的课文，老师对这些课文的讲解，依然没有留给我深刻的印象。选入的肯定有许多名篇佳作，但50年代的语文课已变得有些枯燥。上课时总是千篇一律地划分段落，归纳段落大意，背诵一字都不让改动的“中心思想”，总结出几条“写作技巧”。久而久之，就很厌烦。但语文老师是好老师。除了这些例行的课程安排外，常常会向我们谈到一些作家、诗人的事迹，介绍我们不知道的书籍。高兴起来，便朗朗地读起课本之外的诗文。也举办文学讲座，组织“文学社”讨论作品。也要我们写诗和散文。有一次，我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，写了一篇抒情散文，总有六七千字吧。里面用了许多抒情排比句，来歌颂北自黑龙江，南到海南岛的祖国新貌。我很得意，在“文学社”讨论时，紧张地等待赞赏；还提醒自己，不要太“喜形于色”。想不到的是老师言辞冷峻的批评：“空泛，夸张，还是写你有体会的东西吧。”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凝固了。后来甚至心存怨恨。但从此，我对夸张、空泛，总是十分警惕。这个告诫，是我当时未能真正领会的财富。

虽然喜欢乱翻书，但我们那个地方，书并不好找。读高小是40年代后期，新中国还未成立。我住在南方的一个县城里，当时大概有几万人口。每天上下学，沿着两边有“骑楼”的街道，会走过饭铺、杂货铺、药店的门口，也常常在青果行、米行、竹器行外面停下来观望：对新上市

的香蕉、洋桃垂涎欲滴，或者愣愣地看怎样用竹篾做斗笠、箩筐。但是，记忆里这个县城并无专门的书店，也没有公共图书馆，虽然韩愈当刺史的潮州离我们那里不远，而县城中心就有据说是建于宋代、供奉着“大成至圣先师”牌位的“学宫”。县里只有几家也兼售不多书籍的文具店。当然，也有藏书颇丰的人家，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。我的家不是“书香门第”，父亲是个学徒出身的医生。家里有一些医书，一些基督教的书籍，上海广学会发行的刊物。那时，能得到一本喜爱的书，在生活里是一件重大的事情。

50年代上中学以后，读书的条件有了改善。县里开办了文化馆，我就读学校的图书馆的藏书也慢慢多起来。我的一个同学，家里有不少三四十年代开明书店、良友图书公司、生活书店、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书籍。能读到好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。尽管如此，对于书籍仍产生近于“神圣”的感觉，这种感觉保留了很长的时间。当我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到几本20年代的《小说月报》时，当我终于有零花钱可以订阅《文艺报》、《文艺学习》杂志时，我清楚地记得那种不夸张的“幸福感”。这是现在得到书籍如此容易的时代所无法想象的。

小时候，语文课外的书中，我读得最多的，其实不是最容易得到的武侠和言情小说。我的邻居就有许多这样的小说。但我并不喜欢。现在找起原因来，大概是我太缺乏想象力，对飞檐走壁、腾云驾雾总不能神会，使我现在对武侠这类小说，仍是不感兴趣。这好像是我的一大“损失”，不能有生活中我不熟悉的另一种乐趣。因为我的外祖母和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高小上的是教会学校，所以，读(和听别人读)得最多的，是《圣经》。星期日到教堂做礼拜，听牧师布道，参加学校、家庭里宗教性质的活动，都离不开《圣经》。小时候对教义什么的，并不能理解，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些故事。神创造世界的经过。亚当夏娃偷吃禁果。

洪水和诺亚的方舟。罪恶的所多玛城的毁灭。罗得妻子变为盐柱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西奈山上的十诫。——当然，《新约》福音书中有关耶稣言行的记载，就更熟悉。《圣经》中的许多句子，在我脑子里，比后来读的任何书留下的印象都要深。“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，要有光，就有了光”；“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接着更次看守羊群。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”；“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，为你们生了救主”；“那时，有施洗的约翰出来，在犹太的旷野传道，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该悔改”；“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就砍下来，丢在火里”；“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怜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恤”……

《圣经》究竟留给我什么，实在很难讲清楚。或者说，不能说清楚的比能说清楚的多。现在能想到的也有一些。比如有关“界限”的意识。人和神，已知和未知，今天和未来，善和恶，真实和虚假，真诚和伪善，平庸的生活和理想的境界等等，虽然经常混沌一片，但也不是不可区分。再有就是对于词语的感觉。文字能够创造一个世界，对我来说，真是一种奇妙、甚至神秘的事情。50年代，报纸刊物，包括语文课所推荐的，是一种规范化的语体文。这类文字读多了以后，我一度觉得《圣经》中文译本不大好。我知道这个通行本叫“和合本”。和当时的语体文相比，觉得许多语词、句式别扭，也不很顺畅。当时，我希望有人来重译。待到我厌倦了那些标准化的语体文之后，想法完全变过来了。设想《圣经》里的叙述，那些祝福、歌唱、劝诫的文字，也如五六十年代标准化语言那样，那将如何是好？让上帝、亚伯拉罕、但以理、约伯、耶稣、犹大都

说着我们说的那种“普通话”吗？我真庆幸没有人有我那样愚蠢的念头，去重新翻译《圣经》。

共和国成立后，我爱看的书有了改变。我读了大量五四的新文学作品，也读了许多外国的，特别是苏联、俄国的诗和小说。鲁迅的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和杂文自不必说，却不能理解他的《野草》和《故事新编》。读曹禺的《北京人》（也看县教师剧团的演出），说来惭愧，最喜欢的人物，竟是相当概念化的人类学家袁任敢和他的女儿。初中有一个时期沉迷于巴金30年代的小说，但持续时间很短暂。我在笔记本上抄录普希金的诗，读他的《驿站长》，读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，契诃夫的短篇，普里希文的散文，也读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》、《日日夜夜》、《青年近卫军》。《红与黑》、《包法利夫人》也是这个时期读的，却不能让我很投入。我上中学的这个时期，被看做是中国现代史的“转折”的时期。寻求、确立社会理想和价值观，是那时的“时代主题”。当时，引起我兴趣、能产生“共鸣”的书，好像都和这一“主题”有关。“浪漫”是年青人的“专利”，他们也和“革命”有一种天然的呼应。这些有关“革命”的书籍中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本，尽管它现在已不会有很多读者，文学史对它也不会有高的评价。也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不值得一提的“感人货”。但我永远不为曾经喜爱过它而羞愧。从上中学到80年代，我一共读过三次。当然，每次读的时候，都有很不相同的体验。总的来说，当初那种对理想世界的期待和向往，那种激情，逐渐被一种失落、苦涩的情绪所代替。记得在“文革”两派武斗激烈的日子里，窗外高音喇叭播放著激昂的口号，我却在为保尔和丽达的无望的爱情伤心。

我们的一生里会读无数的书，但让我们难忘的其实不多。这不多的书最有可能是在上小学上中学时读的。而且往往不是语文里的课文。

它们是什么书，对每个人来说不会一样。它们给予我们的东西，有一些则可能永远是个秘密。或者意识不到；或者意识到了，却不愿讲出来。

## 我的“巴金阅读史”

——

这几十年中，比较集中读巴金的书有三次。

最早是上世纪50年或51年，那时我十二三岁，刚上初中。一位要好的同学家里藏有不少开明、良友、文化生活等出版社(图书公司)三四十年代刊行的新文学书籍。同许多走近巴金的读者那样，开始总是会被“激流三部曲”的《家》所吸引。记得读到鸣凤投湖的段落，竟无法控制地痛哭起来，只好躲进家里小屋的角落，幸好这个尴尬的场面没有被发现。50年代初，是一个对“新世界”有着热切梦想的年代，而我又是处在基本上由浪漫想象控制的年龄。在那些年里，文学作品被看成生活教科书，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，也被看成具有绝对关联，甚至是可以等同的关系。我们热衷于以寻找生活箴言的方式进入书本，而且，一旦进入就不愿走出。不仅对巴金，鲁迅也一样。我读书的中学开会纪念鲁迅，墙上、柱子上贴着许多从鲁迅书中摘录的，如“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”、“一要生存，二要发展”之类的格言。巴金作品中对不合理现象、制度的揭露、控诉，对理想未来的热切、坚定期待，发自生命深处的真诚告白、倾诉，对善恶、美丑所做的明确分辨，期待读者情感积极响应的“启蒙”美学观念，都特别吻合少年时代我的生活认识和阅读心理。此后一段时间，我寻找着在那个小城可以得到的巴金的书。当然，并不是他

所有的著作都能对我产生同样的冲击。比如说，现在普遍认为艺术更为成熟的《寒夜》、《憩园》等，当时也翻过，却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：巴金40年代这些作品的细致和阴郁，大概难以从我这样肤浅的少年那里得到呼应吧。

## 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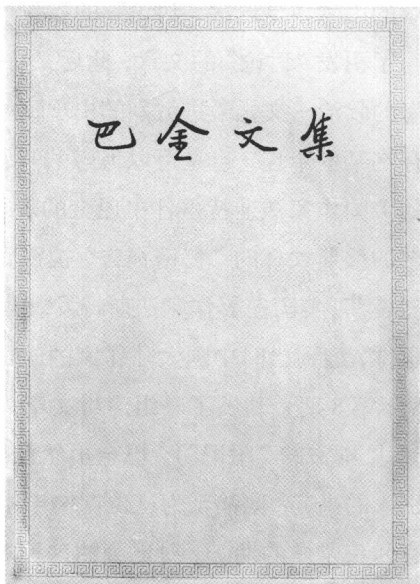
高中以后，读书的兴趣有了转移。那时有点无知的狂妄，觉得从他的书已经不能获得更多的东西，似乎就此告别了巴金的阅读。但过不了几年，我又再一次拿起巴金的书，但这次是完全不同的情景。这是58年底到59年初的事情，当时我在北大读三年级。阅读的动机直接来自58年的“拔白旗、插红旗”的文化批判运动。“反右”和“社会主义革命”的开展，据说需要重新审查一切文化遗产，包括“新文学”在内；而作为一种世界观、生活伦理和精神态度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，在当时成为最需要清理、批判的思想、精神对象。那些在知识青年学生中曾经和仍在发生较大影响的文学作品，在这个时间受到特别关注。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，各地报刊，如《文汇报》、《文学知识》、《读书》、《中国青年》等，开设了各种有明确批评指向的讨论专栏，涉及的作品有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、《红与黑》等，巴金的作品也在其中。

为什么在众多的新文学作家中选择巴金，当时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现在猜想，可能有下面这样一些原因。巴金作品（特别是《家》）在当时仍然有不少青年读者，仍然在“产生影响”，这应该是主要一项<sup>①</sup>。而且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因为仍有许多读者，冯雪峰在1955年第24期《中国青年》杂志的“答读者问”栏目中，就当代重印巴金的作品有什么意义，现在的青年阅读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，从他的作品中能学到些什么这类问题，做了解答。





1958年开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多卷本的茅盾、巴金等作家的文集。这属于现代文学“经典化”的规划之一。到1958年底，《巴金文集》已出版六卷。

在1950年代开始的新文学作家“经典化”过程中，巴金的地位也得到提升。从58年开始，多卷本的巴金的文集，和茅盾文集等一起开始出版（到1958年底，《巴金文集》已出版六卷）。与此相呼应，巴金这个期间也连续发表了多篇创作谈，一些重要文学刊物也发表了大型的研究巴金的论文<sup>①</sup>。这与50年代初，巴金一再检讨自己在“旧时代”的创作，以及一些左翼作家认为巴金的作品已经落伍的情形，发生了明显变化。<sup>②</sup>另外值

① 《和读者谈谈〈家〉》（《收获》1957年第1期）、《谈〈春〉》（《收获》1958年第2期）、《谈〈灭亡〉》（《文艺月报》1958年第4期）、《谈〈秋〉》（《收获》1958年第3期）、《谈我的短篇小说》（《人民文学》1958年第6期）、《谈我的散文》（《萌芽》1958年第9期）等。在这期间发表的重要研究论文，有杨风的《巴金论》（《人民文学》1957年第7期）、王瑶的《论巴金的小说》（《文学研究》1957年第4期）等。

② 50年代初，巴金对自己的“旧时代”的作品，有过不少的自我批判。左翼作家丁玲1950年在《跨到新的时代来——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和工农兵文艺》中也说到，在“新时代”，不要说冯玉奇、张恨水，就是喜欢冰心、巴金的读者，也应该向前跨出一步。